

第 27 卷



王蒙文集



第 27 卷

谈话录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访 谈

就风格、流派诸问题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	(3)
回顾与展望	(5)
答日本共同社记者问	(8)
与《小说界》记者的谈话	(21)
“空中百花园”直播记录	(30)
我看毛泽东	(44)
关于中国文学现状	(53)
圈圈点点说文坛	(58)
与意大利记者桑德罗·维奥拉的谈话	(68)
探寻中国文化更新与转换的契合点	(73)
把中国建设成为文化大国	(91)
敞开心胸,欣赏与接纳大千世界	(95)
答韩国《现代文学》杂志社问	(112)
我只是文化蚯蚓	(114)
“狂欢”也被泪催成	(119)
从“青春”到“饱经世故的清明”	(122)
文学不再高姿态是正常的	(125)
当今文坛泡沫多	(129)

扎扎实实搞学术	(132)
我对文学的未来充满希望	(134)
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	(137)
我永远是学生	(143)
理解比爱更重要	(149)
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尺度	(157)
把自己没有趴下的经验告诉大家	(162)
说《青狐》	(165)
答《中华英才》杂志问	(171)
作家怎么了	(173)
我清醒所以我困惑	(181)
没有她就没有我	(189)
从《青狐》说开去	(193)
沧桑与热情同在	(204)
回归文学传统,从容写小说	(211)
当代文坛的几个话题	(218)
我这三十年	(224)
“文革”和中国崛起	(248)
有同情心的“革命家”	(253)
不是我个人被绑在十字架上	(258)
人·革命·历史	(263)
为历史存真	(289)
“相信”是我的光明的基调	(296)
乐观是一种武器	(300)
关于当代文学的答问	(305)
“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313)
面临现代的传统	(323)
答《新周刊》记者问	(335)

答《南华早报》记者问	(341)
俗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俗	(343)
公信力、包容性和人文精神	(347)
全球化时代如何防止“精神贫血”	(352)
与中华书局友人的谈话	(355)
中国还是要提倡理性,不要动不动就洒热血	(366)
“民族复兴”恐怕很难标准化	(371)

访 谈

就风格、流派诸问题答 《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

记者: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正在形成不同的流派吗?

王蒙:可喜的是,作家们正在表现着不同的风格,至于流派还看不出。我想流派不仅决定于风格的接近,还要有一些其他因素,如流派刊物、文学社团等。

文学与戏曲不同,我不认为文学上形成流派有多么必要。还是强调风格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搞各的也就行了。

记者:您比较留心哪些作家的创作动向?

王蒙:凡能带来哪怕是一点点新意的作家,不论大、小,不论是老、中、青、专业、业余、初学,我都愿意留意。例如,最近我就很注意韩少功、张辛欣、京夫和王安忆的作品。

记者:您有空看外国文学作品吗?近年读了哪些?印象如何?

王蒙:有空就看,看得并不多。我挺喜欢美国的约翰·契佛和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前一个约翰写得生动,后一个约翰写得富有节奏感。

记者:请谈谈您今后的创作计划和艺术上的追求。

王蒙:答不出来。反正是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写,绝不停滞和苟安。努力做到有益于我们的社会和人民。

记者:您比较留心哪些文学刊物?印象如何?

王蒙:《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收获》《十月》《当代》《上海文

学》《钟山》《新疆文学》《延河》《青春》等都看,都有值得看的东西。

也可能我之留意这些刊物是因为我给他们写过稿。

记者:您对《当代文艺思潮》杂志有何希望?

王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平等讨论,服膺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

多介绍一点国内外文艺思潮动态,少发空论。这是二。

注意对文学青年的团结,引导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三。

有货就出,没货宁可不出,宁缺毋滥。这是四。

1982 年

回顾与展望*

记者:新中国建立三十五年以来,我国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这些成就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些什么?

王蒙:我个人印象深刻的有三次浪潮。一是建国十周年前后长篇小说的丰收。最早的是《保卫延安》,其后出现了《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创业史》《小城春秋》,直到稍后一些的《李自成》(第一卷)。这些可以说是至今仍然耸立在那里的长篇创作的高峰。

其次是“四人帮”垮台前后,以四五运动为标志的诗歌运动。我以为,这样的诗歌运动将写在历史上。

第三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中短篇小说与报告文学代表的创作浪潮。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勇敢、痛苦、热情、坚定、沉着、历史感、使命感、探索精神、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与“拿来主义”的胃口与消化力,以及它的群众性、社会性,我以为,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浪潮这个词儿也许不准确,就叫几次丰收也可以。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也有一次小丰收,如众所周知。

文学作品毕竟是个体劳动的产物,你再多讲几次浪潮也概括不了所有的佳作。再说,我对小说以外的体裁也不熟悉。

* 本文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作者的访谈。

记者：您怎样估价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在世界上的地位？

王蒙：我国近年来的创作成果，愈来愈吸引包括西方国家、日本、苏联、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汉学家与文学家的注意。一些国家盛大地举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讨论会，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我接触到的只是有限的翻译成中文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我的印象是，我们完全有理由为近年来我们的创作成果而自豪。在概括生活的深度、广度，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感情与心理的强烈、真挚、细腻，思想的活泼等方面，我常常觉得倒是本国同行们的作品更好些。我们的差距是在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方面。

当然，语言的障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以及文学艺术本身的独特性、复杂性等等必然阻碍着人们公正恰当地评价一个国家的文学成就，特别是活着的人们搞出来的当代文学成就。

我不喜欢什么文学“走向世界”的提法。现在根本不存在什么世界文学的奥林匹克大赛，说什么某篇作品可以“走向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土包子心态（请原谅）。当然，我赞成与国外加强介绍（翻译）和交流。

记者：您怎样评价近年来涌现的青年作家？

王蒙：怎样划分青年作家？

记者：大体上四十岁以下的吧。

王蒙：总体来说孔捷生和张抗抗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唤醒的青年一代的新的觉醒和追求，包括某些不足。张承志表达了新一代的革命理想主义和一种年轻的诗人兼哲人的气概。王安忆和路遥等是那样勇敢、敏锐、忠实地直面人生，让生活、人物、形象说话。陈建功体现了新一代人的锐气，同时不乏机智乃至成熟。韩少功既有清新又有某种深度。邓刚很有气势，也有生活。铁凝似乎体现了更年轻的一批人的乐观、善良、天真，她更少“伤痕”而更多对美、善的信念，虽然也俏皮。唐栋、海波、刘兆林、李斌奎——我不知道李存

葆是不是青年——他们正在开拓着军事文学的新进展,更真实、更注意军人生活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联系,更注意灵魂的探索也更大胆地试验各自不同的表现手法。贾平凹也很有趣,多产,他也是“上下而求索”。噢,还有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剧作家……可惜,我对他们不太熟悉。

总之,他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当然,也有明显的不足。也和我们这些中年作者一样,也有生活根底不足,学问知识不足,艺术修养不足的问题……

记者:正好,最后一个是请您谈谈“不足”与今后展望。

王蒙:我没有展望的水平与本事。当前文学创作的浪潮也带来某种危险。刊物太多,新作太多,平庸之作淹没佳作。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作家,往往在发表了一两篇成功之作、受到称道之后就缺乏后劲了。这就是说,要注意量,更要注意质。其次,要注意创作,更要注意积累。积累是指生活、体验、读书、求师求学等等。现在往往是一出名就文债高筑,入不敷出,早晚会出现赤字、窘态,弄不好就会破产了。

改革、生活的新变化带来一系列伦理、审美上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认真生活、认真学习、认真探讨,才能使文学的步子赶上去。

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使作者和读者受益匪浅。我相信今后会搞得更生动活泼、求实准确。我特别希望有更多、更经常、更严肃而且更亲切的批评,指出当代新作,包括受称赞之作的缺陷、不足,乃至失误,这种批评可以更加认真。有的作品个别看还较好,与作者的其他作品摆在一起看便显示出了某种不妙的势头,批评家有权也有责任提醒一下。

从看《霍元甲》的盛况可以看出人们对娱乐性作品的要求之热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认真的研究。我们完全应该有自己的、更加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提供美好文化休息的作品。

1984年8月23日

答日本共同社记者问

松尾康宪:先生,首先说明一下今天的来意,这次共同社来华访问的目的是了解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实际情况。听说王蒙先生一九八七年访问过日本,先生只是短期接触过这个东方岛屿国家,但是我们日本人的心中对您有一种新鲜和温和的感情。您退出政界以后,《新疆日报》介绍您访问您的第二故乡新疆,受到农牧民诚恳的欢迎,对此我们共同社如实、客观地报道过了。这次,第一次见先生面,衷心表示敬佩,并感谢新华社同仁的安排。第一要问的是,日本这个国家在唐宋时代以前是一个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听说最近先生看了日本的话剧《李香兰》,您看了以后,以文人作家的立场,对军国主义的含义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印象?

王蒙:很高兴和各位见面,本来应该请你们到寒舍去,但是我家里正在施工,有许多工人,像个工地。因为我想把厨房和吃饭的地方改善一下,提高生活水平了!(众笑)家里乱七八糟的不好请你们去,只好麻烦新华社的同志。《李香兰》我看了,而且非常有兴趣,因为我熟悉那一段生活。我的童年是在北京,我的小学时代是日本占领时期,所以对李香兰,对李香兰唱的那些歌,李香兰演的电影以及当时的许多事情和气氛我都很熟悉。另外,家父曾留学日本,那时他在北京担任一个学校的校长,后来还担任过大学的教师,他有许多日本朋友。看《李香兰》引起我很多回忆,感觉非常亲切。对中日关系史上那一段,我想中国人和日本人理解的角度肯定是有不同的,即使

是日本最最理解中国人的人,他们也会有不同的角度;反过来说,即使是中国最最主张中日友好的人,他们也会有不同的角度。我看了以后很受启发——噢,事情原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又找来了李香兰的自传,是由作家协会陈喜儒先生翻译的,我正在读这本书,今年年底我想发表一篇读后感。我觉得我能理解编戏的思路。

松尾康宪:什么时候出版?

王蒙:我还没有写,是一篇文章,我希望今年年底能够登出来,当然这是我的愿望,还要看编辑部。

西仓一喜:我是西仓,是共同社驻北京的分社长。现在人们很关心您的情况,特别是在一系列关于《坚硬的稀粥》的报道之后。我代表共同社向您表示感谢,我们终于有机会和您见面了,因为我一直想有机会向您提几个问题。据说中国的官方的报纸批评您,您用了法律的手段来起诉,我觉得解放以后中国的文学界还没有这样的例子,我想问的是您为什么要以这种法律的手段来对抗?

王蒙:我要说明,和共同社的朋友见面,是近几年来不再担任文化部的职务以后,我唯一的一次、也是第一次和国外的记者交谈,这也是由于新华社的朋友们的热心。《坚硬的稀粥》的事情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因为发生了从政治上给一个作品和它的作者扣帽子的情况,使我不得不有所表示,一般的旁人对我的作品的批评,我从来是不在意的。后来中国的有关领导否定了进一步对我进行讨伐和批判的计划,希望把这件事情平息下来,不再争论,我很拥护中国的领导这样一个判断。我从一开始就认为《文艺报》的做法并不代表中国当局,并不代表中国领导的意图,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不想再谈这件事情,以响应中国领导平息这场风波的意图。

西仓一喜:那您撤销了您的起诉吗?

王蒙:没有。因为我的起诉法院并没有受理,这件事就放下了。

西仓一喜:您是说中级法院?

王蒙:中级法院、高级法院都没有受理。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

并不是创纪录的人,在我之前,天津的一个女诗人伊蕾小姐也起诉了《文艺报》,由于《文艺报》对她的人身攻击。所以我开玩笑说伊蕾是我的师傅。

西仓一喜:《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报纸吗?

王蒙:对。

西仓一喜:您当过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对吧?

王蒙:不仅是当过,我现在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西仓一喜:这就有点奇怪了,由作家协会控制的报纸却攻击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王蒙: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众笑)我认为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本来可以胸怀更宽阔一些,更好地维护中国的稳定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但是他们没有选择这样一个正确的路子。

西仓一喜:最近我收到了一本日本的杂志,您的《坚硬的稀粥》已经被翻译成日语出版。据统计,在上个月里您是十个书卖得最多的作者之一。先生,您觉得为什么您的作品在日本会受到欢迎?

王蒙:我的作品被翻译到日本,这不是第一篇,早在一九八〇年我的作品《蝴蝶》就在日本出了单行本,是由相浦杲先生翻译的,他已经去世了。其次我写的反映新疆生活的小说《在伊犁》也由东京德间书店出版,是由市川宏和牧田英二先生翻译的。《坚硬的稀粥》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的作品也许写得很不错,另一个原因就是《文艺报》帮助我做了推销工作。(众笑)

森保裕:我要问可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三年前发生了“六四事件”,以后您辞去了文化部长职务。有的报道说您拒绝慰问戒严部队,用辞职来表示抗议镇压民主运动。您能不能解释一下那个时候您为什么要辞职?

王蒙:我想这件事中国方面和我本人都曾经清楚无误地做过说明和解释,我正式提出辞职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我写的信现在还保存在文化部的档案里,那个时候显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请求

辞职的理由是为了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最后在人大常委会上李鹏总理提出这个议案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由于他本人希望‘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这个话他用的就是我请求辞职的信上的原话。因为我能创作的是文学,但我能评论的还包括艺术,比如说戏剧、电影呀,还有诸如电视呀这些东西,所以我写的是“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最后李鹏总理的解释也是这样说的。我想我们就不必多谈这个事情了。

森保裕:当部长之前,您是否也不大愿意接受文化部这个职务?

王蒙:是的。所以在一九八六年,其实远在一九八五年就开始酝酿、试探这个事情,我一直是坚决地推辞。一九八六年讲好我就做三年。我为什么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提出来呢?当时是我到文化部上班两年半的时候,我想我在两年半的时候提出来,就有半年的时间可供国务院、总理物色新的人选。这也是过去的事情,都讲过的。

森保裕:您当时拒绝慰问戒严部队……

王蒙:我当时生病,请的是病假。

松尾康宪:如果没有病的话,您是否考虑……

王蒙:没有病的话就按没有病的情况来考虑,有病就按有病的情况来考虑,而且我希望我们大家把眼光放在现在、放在未来,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势头,而且带来了新的希望的时候。

森保裕:您如何评价三年前的事?

王蒙:三年前的事已经成为历史,我觉得三年前的事情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我曾经很担心:一是不希望中国回到闭关锁国、搞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样一个时期。第二我不希望中国发生混乱,不希望中国发生无政府状态。谢天谢地,我所不希望的两种状况没有发生,目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改革开放的方向经受住了这样一次考验。中国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改革开放、保持稳

定,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最近一系列的讲话增加了实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我们还是多讨论现在和未来吧。

森保裕:现在文艺界的情况怎样?您是否认为目前的状况利于文艺创作?

王蒙:文艺界的情况也各不一样,我只能说我的多数朋友关心的是自己的新的作品。特别是这些年好多人正在构思和写作新的长篇,就是我们常说的鸿篇巨制、比较长比较大的作品。如果我们的国家能够做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对创作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不能在混乱中、动荡中进行创作,我们也不能在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判下面,甚至是在“文革”的那种状态中进行创作。事实证明在“文革”中大概没有什么人进行创作。“文革”十年我的钢笔都丢了,需要写字时就向我儿子借用,用完了以后再还给他。

森保裕:从贵国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我对中国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很有兴趣,政治干涉文艺。在这方面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相比,您的感觉如何?现在比以前好一些吗?

王蒙:从我个人来说,我一九三四年出生,一九三七年全面的抗日战争开始,一九四五年的北京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接收,我很快在少年时代就参加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是连年的政治运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必然会对文学有很大的影响,许多文学家参加抗日斗争、参加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这是历史,既不能说成是政治对文艺的干涉、干扰,也不能说是文艺家受到了政治的迫害,这只能说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但从五十年代后期,由于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日趋严重,这样在文艺活动当中就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强硬的办法,要求文艺创作来图解每一个具体政策、具体任务,比如说要入社了,所有的小说呀、歌曲呀都歌唱入社,比如说要“大跃进”了就都唱“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就唱人民公社好!人民公